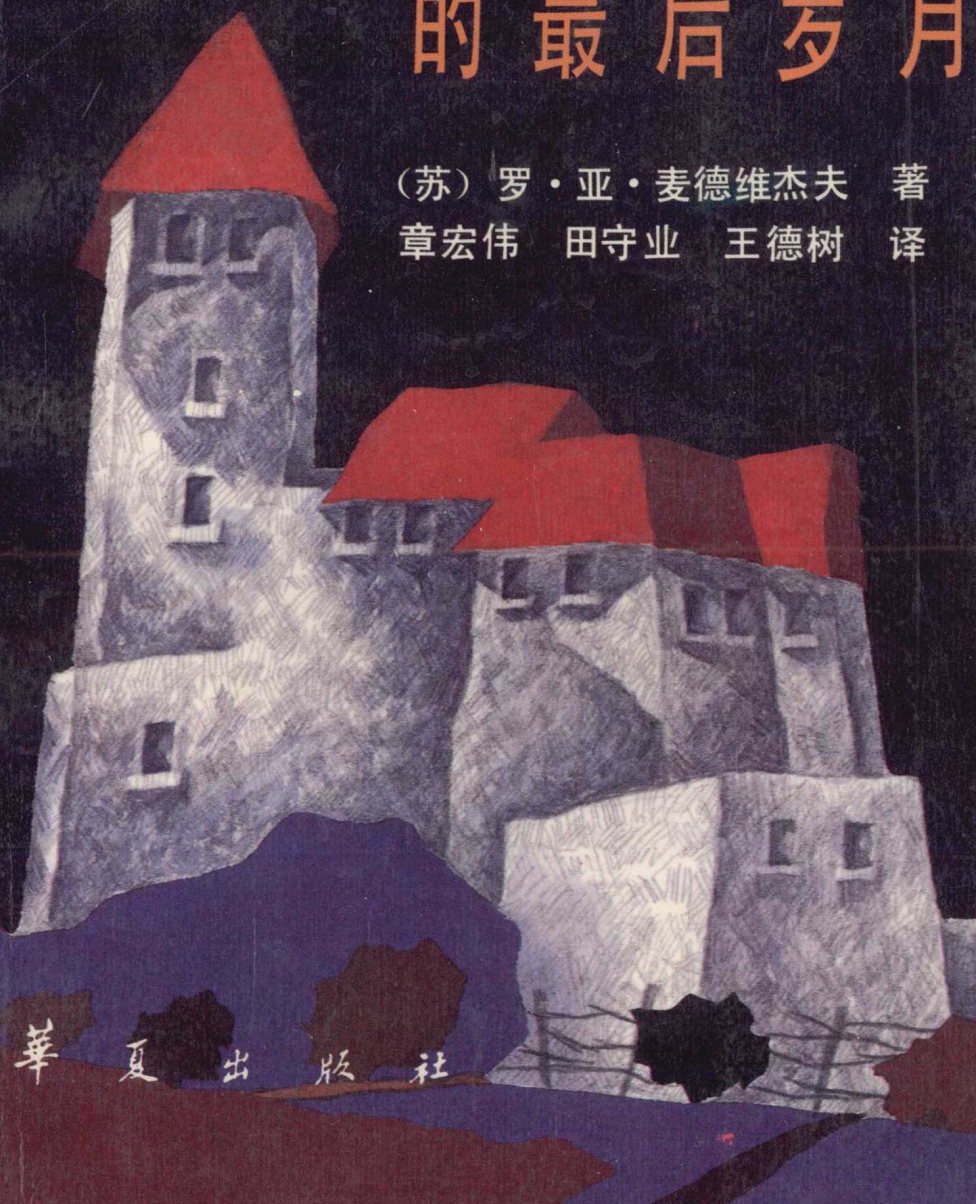


布哈林

的最后岁月

(苏) 罗·亚·麦德维杰夫 著
章宏伟 田守业 王德树 译



華夏出版社

布哈林的最后岁月

Roy A. Medvedev
NIKOLAI BUKHARIN THE LAST YEARS
W.W.Norton & Company 1980

布哈林的最后岁月

〔苏〕罗·亚·麦德维杰夫 著
章宏伟 田守业 王德树 译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四五条内月牙胡同10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5.5印张 130千字 插页2
198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册

ISBN7-80053-350-6/K·030

定价：2.50元

前 言

在苏联，布哈林的名字仍然不允许提及。就是在新近再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以及《苏联历史百科全书》中也没有布哈林的条目，全书自始至终都没有提到他。然而我们却在谈论这位最杰出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家之一：早在十月革命前就已理所当然地成为著名人物的尼古拉·布哈林。在1917年，布哈林是十月革命在莫斯科的最优秀的组织者之一。他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工作了20个年头，并担任政治局委员达10年之久。从1917到1929年，布哈林主持党的机关报《真理报》。列宁经常和布哈林发生论争，却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位学识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的过错大部分来自于他试图“通盘考虑过渡的特殊困难——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痛苦而又艰巨的过渡。”^①列宁在他的“遗嘱”中称布哈林是“党内最伟大和最宝贵的理论家”，而且“理所当然地是党所喜爱的人。”尽管在他们两人之间经常发生分歧，列宁本人对待布哈林却几乎象对待儿子一样，怀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友情。在列宁弥留之际，布哈林比其他任何人花费了更多的时间来和他谈话。列宁逝世时，他的妹妹玛利娅·乌利扬诺娃首先把这一噩耗告诉了布哈林。

列宁逝世之后，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成了党的毋庸置疑的第一流的理论家。当时所谓的“党的总路线”，都是出自布哈林之手。他还是斯大林指挥下的布尔什维克武装力量的总参谋。所以，在那段时期，布哈林有时会受到所谓的“左派”反对派的比

^① 《列宁全集》第36卷俄文第五版第303页。

对斯大林更加断然的大肆反对，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托洛茨基曾经说过：“跟斯大林站在一起反对布哈林——是的，这是可能的；跟布哈林站在一起反对斯大林——决不会。”

“党的最好的理论家”，“党的最优秀的工作者”，“我们大家全体爱戴和支持的人”——所有这些对于布哈林的溢美之词，都是出自党的“14大”上的奥尔忠尼启泽、莫洛托夫、斯大林及其他发言者之口。苏联的一位非官方历史学家在几年前写道：“在20世纪的革命编年史中，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的名字被列在列宁之后的第一位将是公正的。”当然，这样的评价是有些言过其辞，但是却含有一层重要的真实道理。

在我国，仍然有一部分中间一代的人，将布哈林的名字和诸如“人民的敌人”、“叛徒”等等概念连在一起。确切地说，这些毕竟几乎都是在党的“20大”之前的20年间我们的出版物所写到的关于布哈林的情况。可是，在“20大”之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却几乎完全把布哈林这个名字忘掉了。他们所知道的一切仅仅是：布哈林是“共产主义者左派”的领袖，他反对在1918年缔结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不出10年，即1928年，就是让同一个布哈林却已经成了“右派分子”的头子，他抵制强迫推行集体化和对富农的肃反运动。

在《列宁全集》的人名索引中，人们可以找到少量的有关布哈林的资料，这些极少量的资料对于今天从事宣传的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最起码的东西，因此，值得将这一条目在此全部列出：

布哈林·尼古拉·伊万诺维奇(1888—1938)—1906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在莫斯科各区担任宣传员。1911年侨居国外。1915年为《共产主义者》杂志撰稿，在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和民族自决权等问题上持非马克思主义立场。同皮达可夫和博什建立反党集团。十月革命前夕维护孟什维克-托洛茨

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在俄国取胜的论点。在党的第6次代表大会上抛出反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提纲，否定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联盟。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任《真理报》编辑、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多次反对党的列宁主义政策；1918年领导“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党集团；1920—1921年党内工会问题争论期间，先采取“缓冲”立场，后参加托洛茨基集团；1928年起领导党内右翼反对派。1929年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1937年因进行反党活动被开除出党。^①

对这条索引加以反驳以及详述布哈林各个方面的革命政治活动，不是我们眼前这本书的目的。在近来10年多的时间里，布哈林这个人物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历史学家的兴趣。在西方60和70年代出版的论及布哈林思想和最终命运的书籍中，我们可以提到乔治·卡特科夫的研究成果——《审判布哈林》（伦敦巴茨福德出版社1969年版）以及A·G·勒维的《世界历史是世界法庭。布哈林：共产主义的幻想》（欧洲出版社，维也纳——法兰克福——苏黎世1969年版）。在1972年和1973年，意大利共产党出版机构留尼蒂出版社出版了两部大型的苏共党史文件选编，其中布哈林的著作占有突出的地位（N·布哈林、E·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著：《社会主义的积累》，罗马1972年版；以及布哈林、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不断革命和在和平独奏曲中进行的社会主义》，罗马1973年版）。关于布哈林的最有价值 and 最为重要的著述，无疑首推美国历史学家斯蒂芬·F·科恩大卷本的《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政治传记，1888—1938》（纽约诺夫出版公司1973年版）。该书据称一方面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于作为革命家、政治家和理论家

① 《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人名索引》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8页。

的布哈林所产生的兴趣，另一方面又以开辟进一步研究的可能性而助长人们对布哈林的兴趣。

这里没有涉及到报纸和杂志上大量登载的有关布哈林的文章——众所周知，在1978年，对于布哈林的特别广泛而又热烈的讨论尚未在西方的出版物中表现出来。国外的一个学者，布哈林著作的编纂者——西德尼·海特曼，对于由历史学家和政治评论家就布哈林的活动和人格方面表现出来的兴趣作了下面的证实：

在所有列宁的接班人当中，唯有他不仅作为一个政治领袖和理论家赢得了伟大的权威和影响，而且还在党的领袖以及党员中赢得了极高的个人声望，……布哈林个人的吸引力是基于他的坦率、诚实和正直。虽然他看起来貌不出众，但每一个了解他的人都无不为他个人的热情和平易近人的性格而感动不已。敏捷的才思、锐利的谈吐和清晰的头脑大大地超过了他简朴的衣着、羞怯的举止以及超然的神情。他过着一种刻苦的、几乎是修道士的生活，工作时间极长而无规律，且极少关心舒适的物质条件和宜人的生活环境。自从20世纪20年代初期和他的第一个妻子分手以后，布哈林把除了睡眠以外的所有时间都奉献给了党，不停地进行研究工作。他贪婪地阅读几种文字写成的书籍，并且能够同教授权威讨论20世纪形形色色的理论观点。尤其特别的是，苏维埃俄国的青年人对他极为崇拜，他们和他泡在一起，并从他的作品中汲取巨大的精神力量。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布哈林出席的无数次会议上，只要他一登上讲台，就会引起一阵长而喧腾的欢呼声，他的演讲，总是在大家的激昂情绪中结束。除了常常被共产党和非共产党人的评论者善意地将列宁和他相比外，直到那时，在党的历史上还没有其他任何一个人拥有如此深孚众望的地位。

与此同时，在托洛茨基垮台以后的年月里，布哈林还在共产主义世界博得了比列宁的任何其他接班人更为广大的权威。在他一生的顶峰时期，他在党、苏维埃和共产国际的为数众多的组织中担任了领导职务。这些组织包括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以及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维埃主席团，以及共产国际的中央机构（1926年继季诺维也夫之后任主席）、苏联共青团、工会中央理事会、红色工会国际、红色教授学院、共产主义科学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还有其他众多的有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学、教育事业方面的决策和行政机构。不仅如此，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中，布哈林还是党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主要代表和发言人，在作出决议和制定正式宣言方面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在他担任《真理报》主编期间，其权威和影响进一步提高了，从1917到1929年（除了在1918年有过短暂的中断之外），他一直担任这一职务。

然而回顾起来，应该引起人们注意的是，虽然布哈林在苏维埃和共产国际体系中获取了最高级的职位，但他对于布尔什维主义的发展演变所发生的最为重大而持久的影响力却不是由于他操纵了权力机构及其象征的结果，而是由于他那强有力的思想所造成的。布哈林首先是一个知识分子。对他来说，进行共产主义斗争不仅是同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作斗争，而且还要进行人们思想上的斗争，正是这后一点，布哈林为之献出了大量的努力。拥有一个锐利敏捷的头脑的第二号人物要算托洛茨基，他惊人的渊博学识是党的任何其他领导者所无法比拟的，而且加上文笔流利，故被视为他那个时代最有才干和最为多才多艺的思想家，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非共产党人都这样认为。1917年前后，他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所面临的一系列众多问题上的观点对党的意识形态发挥了除列

宁之外比任何其他人要大得多的影响。布哈林作为一个经济理论学家，在共产主义世界是无人与之相匹敌的，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原理的开创性的研究和改造，在他活着的时候，一直都是党的经典著述。纵览布哈林在哲学、社会学、政治理论、心理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和教育这些完全不同的学科方面的著述，可以发现，他在指导党为在这些领域努力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方法的基础方面，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最后，作为一个上百种书籍、小册子和文章的作者，作为一个在无数党、苏维埃和共产国际会议上的经常的发言人，以及作为一个在其他无数特殊的和群众性的组织中的当然参与者，他不仅帮助了当时奉行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形成，而且还在党内、在非党群众中、以及在苏联以外进行宣传，并使之通俗易懂为人接受。列宁在众所周知的“遗嘱”中对布哈林作为党的“最宝贵和最重要的理论家”的性格刻画，几乎普遍地为全俄国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接受。所以我们说，苏联国内外的观察家把布哈林视为他那个时代第一流的领袖人物以及列宁的合法继承人和接班人，是公正无倚的。^①

本书将描述布哈林在一生中最后的年月里所发生的一些大事件。这些事件在前面引用的传记中完全被无声无息地省略掉了，而且许多细节还从来没有为致力于布哈林研究的学者们所获知。

① 布哈林：《社会主义道路》，S·海特曼主编，纽约奥米克隆书社1967年版第37—39页。

目 录

前言.....	(1)
一 在一个新的10年的前夕.....	(1)
二 党的第16次代表大会.....	(16)
三 1931~1933年间的布哈林.....	(24)
四 党的第17次代表大会.....	(53)
五 主编《消息报》.....	(59)
六 第一届苏维埃作家代表大会.....	(67)
七 1934年12月~1936年2月.....	(90)
八 在国外.....	(106)
九 1936年的艰难之夏和多事之秋.....	(115)
十 最后几个星期的自由.....	(126)
十一 调查.....	(134)
十二 审讯.....	(143)
代跋.....	(159)

一 在一个新的10年的前夕

1930年1月1日晚间，斯大林正在克里姆林宫的寓所里同朋友们一起沉浸在庆贺新年的欢乐气氛之中，这时传来了一阵敲门声。他走过去开门迎接新客人——这些“不速之客”。发现有3个人手捧几瓶葡萄酒站在门口，他们是——尼古拉·布哈林、阿列克塞·李可夫和米哈伊尔·托姆斯基。他们是为了同斯大林友好地和解而来的。

这时，同所谓的右派分子进行的一场短暂的、但有时是相当激烈的斗争，大体上已经结束了，结果是——斯大林赢了。对斯大林来说，这场最初纯粹发生于政治局内部的斗争，从许多方面来看，都要比同“左派”反对派的斗争困难得多。布哈林曾坚持要继续实行并进一步发展“新经济政策”——其基本特征已由列宁勾划出来了。列宁写道：“新经济政策”正在“认真地和长期地”在国家推广开来，党要在一个农民国家这样背景下的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就必须采取“新经济政策”这种方法。这就是为什么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要出来反对扩大斯大林提出的对富农分子采取非常措施，反对强制推行集体化和庞大的工业建设计划的原因，因为在他们看来，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新经济政策”在实际上是被放弃了。谁也无法预料斯大林的新路线将要把党和国家引向何处，也不知道这场新的意想不到的“自上而下的革命”将如何进行，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毫无疑问，在1927年秋天开始出现并在1928年进一步恶化的谷物征购的困难是极其严重的。问题的产生，确实是与1925~

1926年间形成的一整套错误的经济政策相关联的，而布哈林本人曾经积极参与了这些政策的制订。结果是，国家定的价格太低。另一方面，过早地降低许多工业品的价格和削减农业税，同许多工业产品标价的上涨一起——所有这些因素严重地影响了农村向城市自愿出售谷物。斯大林建议采取措施，特别是从富农那里征购谷物，使谷物的平衡和向城市的供应得到了一些改善。但是这些措施却受到了富农、中农以及大批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的反对。还有来自党的经济学家和财政专家们的反对。起初，布哈林赞同使用非常措施，但很快他就认识到，继续推行这一政策将是巨大的冒险。他建议应该放弃它并寻找一种新的经济政策来渡过危机。他认为，提高谷物收购价格和农业税，增加国家所需物资的生产，将会消除压力。为了阻止富农分子捣乱破坏，保证城市的食品供应，布哈林建议暂时削减重工业建设的配给并从国外购买一些必需的粮食以供养城市。这样，农村所需要的工业产品的产量将会增加，某些产品——按照布哈林的说法——将由国外进口。所有这些措施将会使迫在眉睫的经济和政治形势的危机得到解决而不需借助于暴力。农业生产和消费品的增长，将会使资源积累起来，并反过来促使计划发展中的重工业得到迅速恢复。至于集体化，布哈林坚持说，在可望实施的“五条计划”中必须保持相当稳健的步伐。在布哈林看来，强制推行集体化、在得不到国家起码的技术和财政上的赞助的情况下或者在集体制方式方面没有领导经验的情况下建立成千上万个集体农庄，好似一桩十分冒险的生意；不增加农业生产，这些集体农庄将会导致垮台。

开始，布哈林的建议得到政治局多数的支持。斯大林在忽然发现自己处于少数时，便想争取时间。在最初的好几年中，他从没有用过一个假期的时间在高加索进行考察，而是外出旅行西伯利亚，这里谷物剩余特别多，然而收购的却格外地少。斯大林在诺沃西比尔斯克和巴尔瑙尔花了一些时间视察了某些特殊地区并

和当地的工人农民进行交谈。他感觉到党和苏维埃的工作者几乎没有什么人持有和他相同的观点，便怒气冲冲地从旅行中回来了。这是他最后一次到乡下旅行，直到他去世，就再也没有到农村去视察过。他的活动领域是在内部的政治斗争方面，当时他把一切精力都集中到这上面来。对他来说，公开承认错误是根本不可能的。鉴于布哈林和李可夫曾经使他们自己在最大程度上将这次论战性的争论局限于政治局内部这个事实，斯大林便开始公开否认政治局内部有任何分歧，并且在整个1928年当中，他只是含糊其词地指出“来自右的”或“左的”倾向的危险。尽管这样，在1928年底，斯大林还是设法将加里宁和伏罗希洛夫争取到自己这一边。这样，在有了政治局的多数的支持之后，斯大林便在1929年1月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发起了对布哈林的突然攻击。他的讲话如下：

同志们！不管多么令人痛心，也不得不确认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党内形成了由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组成的特殊集团。过去党一点也不知道有这个集团存在，因为布哈林分子对党严密地隐瞒了这个集团存在的事实。但是现在这已经是尽人皆知，有目共睹的了。从这个集团的声明中可以看出，它有自己的、和党的政策对抗的特殊政纲。……①

这种说法是不真实的，因为是斯大林而不是布哈林首先向党长期隐瞒了他同政治局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的事实。斯大林将布哈林以及具有同样思想的同事们的观点袒露出来，则更是错误的和不适当的。不过，在仍然不能确定得到中央委员会内部的普遍支持的情况下，同时也为了避免将所有棘手的问题拖到全党进行公开的评论，斯大林提议不得将（1929年）1～2月份召开的中

① 《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74页，

央全会的详细经过公布于众。在1949年出版的《斯大林选集》第2卷中首次发表了斯大林在全会上讲话的某些摘录。

布哈林派(及其政治路线)同斯大林派之间在1929年2~4月期间发生的冲突,结果将是具有决定性的。这场冲突的本身主要表现在政治局内部的激烈交战之中,例如在同年1月30日和2月9日举行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党的积极分子通过从政治局那里收到的受到专门限制的信件中了解到了这些争论;这些信件使他们对国家的局势和上层集团的动向有了一个最基本的了解。

在党内斗争中,布哈林远不是一个行家里手。然而,斯大林却从一般攻击富农和新经济政策入手,继而设法寻求同胆怯的“左派”反对派(当然托洛茨基除外)发生联系。结果恢复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党籍;刚刚被派往各省的“左派”领导人也开始一个又一个地回到莫斯科并担任负有责任的职务。在另外一些人当中,他们包括格奥尔基·皮达可夫、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拉狄克、斯米尔加、谢烈布里亚科夫和斯米尔诺夫。与此同时,布哈林试图联系加米涅夫来讨论党内出现的新动向,则被立即谴责为企图建立另一反党派别,是分裂党的一个步骤,等等。

还在这以前的1928年秋天,布哈林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的文章,提出了一个通过扩大新经济政策并使之现代化而不是进一步“革命”的方法来解决国家经济困难的计划。在这篇文章中,布哈林明确表示拥护限制富农活动,发展合作,以及实行更加合理的价格管理的政策。他为计划经济的原则辩护,但却强调注意使计划走向粗暴的极端的危险,因为要预见到所有的偶然事故是不可能的。他论证说,工业计划必须和农业的发展保持协调,而且还必须考虑到国家实际拥有的资源情况。工业化的实现决不能以削减农业产量为代价来完成;工业化的步伐必须是合理可行的;必须优先大大地加快生产,同时降

低消耗。

这篇文章出笼之际，斯大林忍着没有同布哈林发生争执。他甚至还在一次讲话中声称布哈林提出了一系列“完全可能的和合乎情理的”理论问题。^①

在1929年1月底举行的“列宁逝世5周年纪念大会”上，轮到布哈林发表讲话。在题为《列宁的政治遗嘱》的演讲中，布哈林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921年和1922年发表的文章和讲演，详细地阐明了列宁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未来前景的展望。所有听到或读到这篇演讲的人都会清楚地看出，斯大林的新政治路线比布哈林提出的政治路线离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更远。但是对斯大林这种间接的冲击，结果证明是没有多大影响的。

斯大林及其支持者便分头行动起来。他们几乎动员了一切能够动员的力量来反对布哈林。列宁同布哈林在1915年和1916年间在国家问题上发生的理论分歧，也被他们从历史中挖掘出来。还有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时期发生的列宁与布哈林之间的分歧，就更不用说了，那时布哈林是“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头头。那些针对布哈林在1925~1927年间打算使新经济政策的经济和政治基础与最近的形势相适应而发表的著述和演讲以及同全党一起反对“左倾”倾向的论战性文章的批判，是模棱两可的。当时党一直都在探寻一条无人知晓的道路，应该说，布哈林在他的著作中有一些不准确或考虑不周的设想是极其自然的事。同样地，就是在列宁于1918~1920年期间所写的著作中，也有相当多错误的或考虑不周的方案。列宁往往公开承认这些错误，并提到将来不可避免地也要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总体上看，布哈林在1925~1927年间所采取的路线不仅是正确的，而且还是当时党的领导所采取的官方路线。

^① 《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24页。

布哈林在1925~1926年关于富农和资本主义因素在城乡中的地位论述遭到了粗暴的歪曲，而且他本人也很快删除和矫正了他的“使你们自己富起来！”的口号。在推行新经济政策期间，布哈林确实对资本主义因素在城乡的命运给予很大的关注。当时他完全遵照列宁的观点，表示赞成将个体小农经济维持下去，扩大初级阶段的合作；合作将逐渐说服农民走向全面的合作化生产及社会主义本身。布哈林将这个过渡看作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不是瞬间的革命；列宁本人也曾一再指出，农民过渡到社会主义将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而且与此同时，富农的土地所有权将继续扩大。布哈林认识到了这一点，并没有把这视为危险。他预言，随着富农阶级的演变，它将会逐步走向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由于随着社会主义工业的发达，随着国家信贷金融制度以及合作化组织事业的发展，富农将不可避免地丧失掉一切独立地个体发展的可能性。布哈林也确实谈到将“富农土地所有制长入”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去。可是他更说到富农成份在扩大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的“异己本质”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城乡富农分子加以限制和进行再教育的可能性，甚至在它们同社会主义成份竞争的时候也是这样。不过他坚信无论在经济生活还是在政治生活方面的一切领域中，社会主义将永远占有统治地位。不用说，这只不过是一种预防性的理论——其可能性毕竟是针对社会主义经济沿新经济路线进展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而言的。

布哈林对这个问题的基本看法是在1925年出版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工农联盟》一书中提出来的，该书一直都是他论述新经济政策理论的主要著作。作者本人在该书的序言中指出，书中所阐述的思想，是1922年末在和列宁的一系列长谈之后，受到启发而形成的。实质上，这本书为1925~1927年“党的总路线”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上的出发点。

然而，布哈林在20世纪20年代写下的或讲述的，在1928年冬

和1929年初春还是被片面地和肆无忌惮地重新加以评价。个别句子和段落被从中抽出来,而且往往遭到曲解。于是布哈林开始被宣布为列宁的永久敌人和对手、集体化和工业化的敌人、全苏联富农阶级和一切“耐普曼”投机分子意识形态上的支柱、“社会民主党”对布尔什维克党人施加影响的一条通道、一个存心让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人。同样的论点,仅仅还在几年以前被“左派”反对派用来反对斯大林本人,而现在却不加任何来源说明就被借以用作对布哈林及其集团的攻击。

很自然,在来自党的机器的集中阵势的猛烈攻击面前,布哈林作了自我抵御。他不仅指出列宁的观点和列宁所说的话,而且还引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所做的决议——而后者,巩固了当时对“左”倾倾向的胜利。这些决议为党发展和完善新经济政策指明了方向。这次大会显然毫不含糊地谴责了“左派分子”要求针对农村的富农和“耐普曼”投机分子进行一种“新的革命”。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表现上,布哈林所提出的主张和言论毫无疑问都更接近于可以称之为“现代列宁主义”的东西。从让社会主义以一种完美、健康的方式发生演变的角度来看,显得更为可取。然而不管怎么说,在1929年春,斯大林在党中央委员会明显地取得了多数,这就决定了这场斗争的结果将有利于他本人。这一点在同年4月份举行的下一届中央全会上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4月会议”巩固了斯大林的胜利。“右倾”倾向受到了谴责,被斯大林划定为“右倾主义”观点和理论的宣传,也被诬蔑为同党的领导唱对台戏。由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整理的布哈林的发言和讲话一直都未发表;大会还进一步决定从已发表的斯大林讲话的原文中删掉30多页,表面上的理由是为了党的团结。布哈林不赞成4月会议所做的决定。当然,他无法预见斯大林的政策最终将会把党和国家引向何方。可是,他也认识到,在目前形势下要象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他们在兴盛的时候所做的那样,同中